

DQ52/1002
目 录

开头的話 1

第一章 封建兼并战争和曹操统一北方

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6
二 逐鹿中原的开始 14
三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23
四 兖州的争夺 28
五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 34
六 荡平徐淮 41
七 一个世代官僚地主势力的发展 48
八 声东击西，后发制人 54
九 抑制豪强，以法治军 61
一〇 “东临碣石有遗篇” 68

第二章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一一 “三顾茅庐” 75
一二 《隆中对策》 80
一三 “保江东，观成败” 85
一四 一场战与降的争论 91
一五 诈降和火攻 99
一六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106

一七	渭南大捷和削平“国中之国”	112
一八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118
一九	“得陇”不“望蜀”吗？	123
二〇	“威震华夏”	128
二一	白衣渡江	135

第三章 三国的政治、军事和诸葛亮治蜀

二二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142
二三	从“唯才是举”到“中正九品”	147
二四	火烧连营	152
二五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159
二六	“集众思，广忠益”	164
二七	邓芝使吴	168
二八	“七擒孟获”	171
二九	“五出祁山”	177
三〇	“推子八阵，不在孙吴”	184
三一	一个有谋略的人物	187
三二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	196
三三	“乐不思蜀”	199
三四	从孙权后期到孙皓	207
三五	“一片降幡出石头”	213

第四章 三国的经济和文化

三六	屯田和水排	221
三七	“神刀”和蜀锦	226
三八	山越和夷洲	231
三九	《伤寒杂病论》和麻沸散	236

四〇	绞机、翻车和指南车	242
四一	“建安风骨”	246
四二	“贵无论”	253
附录	三国大事年表	257

开 头 的 话

——三国概说

三国的历史共九十年，从公元一九〇年军阀混战开始，到二八〇年晋灭吴统一南方为止。但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则是从二二〇年曹丕称帝开始的。

为什么三国的历史不从二二〇年算起呢？这是因为三国有个形成过程，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是在东汉的统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及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魏、蜀、吴三个政权正式建立前，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已基本形成了。因此，三国的历史应该包括三国正式建立前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讲三国的历史，应该从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讲起。只有这样，才能对三国的由来、三国的人物和三国的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

魏、蜀、吴三个政权中，孙吴的统治时期最长。从孙权二二二年称吴王，到二八〇年孙皓投降西晋，共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二二〇年曹丕称帝，到二六五年司马炎废掉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共四十五年。最短的是蜀汉，从二二一年刘备称帝，到二六三年刘禅亡于曹魏，共四十三年。

三国时期历史的突出特点，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斗争激烈，战争频繁，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在黄巾起义以前，由于东汉豪强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形成

了封建割据的物质基础。黄巾起义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地方豪强和官僚地主的武装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冲破中央集权的外壳，割据一方，互相间展开了兼并战争，使一直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

在军阀混战过程中，腐败保守、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最厉害的军阀，如董卓、袁术和袁绍之流，都先后失败了，较开明的曹操、刘备和孙权的势力则逐渐发展壮大。二〇八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打败曹操之后，曹操退回北方，向西北发展势力，注意恢复北方经济，稳定了内部统治。孙权刘备分别向东南和西南扩充势力取得了成功。三分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后，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较小的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蜀国辅政的诸葛亮继续与吴国孙权结盟，凭借破坏较少的南方经济，共抗曹魏，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北方政权，一时无力消灭南方政权，维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三国鼎立局面。

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对东汉末年大混战来说，是个历史的进步，是趋向三国统一的必要步骤。

过去封建史家在写三国历史时，有所谓谁是“正统”之说，即谁是合法统治者。有的以魏为正统，扬魏抑蜀；有的以蜀为正统，扬蜀抑魏。其实，曹、刘、孙三个集团都是地主势力的代表，他们之间所进行的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扩大地盘，争夺全国治权而进行的兼并战争。问题不在于哪个地主集团应该建立统治，而在于哪个集团有力量能够战胜对方，实行统治。事实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方面，主要是魏和蜀，都没有力量吃掉对方，实现统一。三国分立后，战争相对减少，在人民群众辛勤劳动下，各国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

恢复和发展，为以后三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由于黄河流域的经济恢复发展比较快，政治比较稳定，形成了力量优势，最后北方统一了南方。

三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和进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指出：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①三国时期也不例外，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

较为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实践，锻炼了一批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曹操和诸葛亮。

曹操主要活动于三国政权正式建立前的军阀混战时期。他消灭了不少军阀势力，统一了北方，注意缓和阶级矛盾，改革东汉以来的弊政，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抑制豪强，维护统一，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过去，一些戏剧、小说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把曹操当成篡汉的“奸臣”，加以否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诸葛亮主要活动于三国鼎立时期。他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创建政权，辅佐刘禅治理西蜀，“七擒孟获”，“五出祁山”，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一些戏剧、小说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能呼风唤雨的“神人”，加以美化，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有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他们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学在三国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以曹氏父子（曹操、曹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六六年版第585页。

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东汉经学加在人们思想上的束缚,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作品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开创了所谓“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

历史不能简单类比,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斗争内容,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但三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军事斗争,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曹操诸葛亮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和作风,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三国时期劳动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间的经常用兵,使劳动人民家破人亡,幸存者要承担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无地和少地农民——佃客、部曲,被束缚在国有土地(指屯田地区)和地主的土地上,从事牛马一样的劳动,要缴纳收获物的一半左右,作为地租。尽管三国的统治者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苦的。当他们走投无路时,便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但这种斗争往往被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掩盖了。

三国时期世代官僚地主势力开始抬头,他们利用九品中正制度,逐渐垄断政权,到西晋时期便形成了具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门阀世族。曹魏后期的“赐客”和孙吴的“复客”制,把农户赏赐给官员,是西晋按官品占田荫客制的先声。

三国时期,北方(黄河流域)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经济得到了开发和进步。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吴蜀的开发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过去,人们对祖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以三国史为最多。一些三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人所共知的。但人们的这种知识不完全是从历史书中得来的,很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有关的戏曲中

得来的，因此不免有些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地方。《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一些情节，使事件更加具体，人物更加典型，起着文学作品应该起的作用。但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著作不同，我们今天了解三国的历史，不应该根据《三国演义》，而应该主要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以及其它有关史籍，从中了解、研究三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评价三国人物的历史作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既联系又区别地加以对待。

史话不仅与历史演义不同，与历史故事也有区别。它写的是历史真实，不容许有任何虚构和夸张；要求写得生动活泼和通俗易懂，以便读者较为省力地获得一些历史知识，从中得到一些教益。这本史话就是按照这一精神来写的。

要较为全面地介绍三国的历史，完全按时间先后来写是有困难的，也不容易将问题交代清楚。本书对三国的兴亡过程，大体是按时间先后安排的，并且以曹操、诸葛亮的事迹为主线，通过对人物的分析介绍，来揭示当时的历史面貌；对三国的经济和文化，只好单列章节，进行重点介绍了。

第一章 封建兼并战争和 曹操统一北方

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起义和东汉统治的崩溃

东汉王朝经历十二个皇帝，近二百年。

东汉的建国者刘秀，出身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曾祖、祖父、父亲曾做过郡县长官。刘秀本人还是一个大商人地主。东汉的“开国功臣”，好多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如邓晨、李通、邓禹、寇恂、耿纯、刘植等，他们不是“世吏二千石”，就是“乡闾著姓”。东汉政权建立后，朝廷的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一类人中选用的。

这一情况，与西汉不同。西汉的建国者多为“布衣之士”，即较为贫寒之人。刘邦出身自耕农，做过地方小吏。他手下的重要将相也多出自下层，如肖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不是县级小吏，就是小手工业者或自耕农。

尽管西汉和东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东汉政权一建立，就表现出维护豪强大地主利益的特点。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废除了盐铁官营制度，这对商人地主更为有利。因此，大地主势力在东汉一代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如贵族地主济南王刘康，有田八百顷，奴婢多至一千四百人。官僚地主

郑泰，有田四百顷。不做官的豪民地主（包括商人地主）的势力更有明显发展。东汉后期的思想家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概括指出：他们“占据着广袤而肥沃的土地，居住着富丽堂皇而又众多的宅院，蓄养着成千的奴婢，役使着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车船周游四方，珍宝奇货，很大的仓库也装不下”；“荣乐过于封君（王侯），势力侔（音谋 móu，相等）于守（郡守）令（县令）。”各类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广大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兼并，自耕农不断沦为佃农、雇农，身份不断降低，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斗争。外戚或宦官操纵政权，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一种现象，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还需要有其他条件。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他们可以利用太后、皇后的关系控制朝政。当年幼的皇帝即位以后，皇太后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同专权的外戚就发生矛盾，怎么办呢？他们往往依靠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即太监），把外戚势力搞掉，这样宦官又攫取了大权。等到这个皇帝死后，另一个母后及其父兄又选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权，又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幼小的皇帝长大后，又依靠宦官打击外戚。于是就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他们结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彼此勾心斗角，倾轧争夺，非常激烈。大体上，在桓帝刘志（一四七年——一六七年在位）以前，是外戚势力居优势，桓帝以后是宦官势力居优势。不管哪个集团得势，他们都是任意侵夺土地，盘剥人民，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桓帝时，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个是顺帝皇后，一个是桓帝皇后）任大将军，他凭借政治特权，侵占京师洛阳周围近千里的

地方，作为林苑，供自己游玩，又修了一个“兔苑”，占地数十里。有人不知禁忌，误杀苑中一只兔子，就有十余人被牵连惨遭杀害。他还派出大批爪牙到各地敲诈勒索，聚敛珍宝，甚至强迫几千贫苦农民作奴婢，还诡称这些奴婢是“自卖人”。他的亲戚、党羽布满朝廷和各州郡，“威行内外”。官吏要想升迁，先要向他送贿，上任后再疯狂掠夺老百姓捞回来。梁冀掠夺的钱财多得惊人。后来，桓帝结合宦官捕杀了梁氏一门，没收他的财产，拍卖的价值竟达三十多亿钱，相当于东汉政府当时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从这个数字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剥削。

单超、具瑗、唐衡、左悺（音贯 guàn）、徐璜等五个宦官因诛灭梁氏有功封侯，世称“五侯”，朝廷大权又落到宦官手里。宦官的贪暴，同外戚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收养子，抢美女，“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他们的兄弟、姻戚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长官，大肆掠夺，“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他们，称徐璜为“徐卧虎”，称左悺为“左回天”（指权势之大，有回天之力），称唐衡为“唐雨堕”（指残害百姓，流毒象下雨一样遍于天下）。桓帝和灵帝刘宏（一六八年——一八九年在位）时期的大宦官侯览，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公开霸占民田一百一十八顷、民宅三百八十一所。他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邸宅十六区，每区都有楼阁、亭台、池塘。他还派人到处拦路抢劫，掳掠妇女，发掘坟墓掠取宝物。他的哥哥侯参做益州刺史，倚势搜刮了一亿钱，金银、锦帛、珠宝装满三百多车。灵帝时期的宦官张让、赵忠等，搜括民脂民膏更加凶残。他们的“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

宦官势力的发展，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其他集团的利益，又

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斗争。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官僚机构，从秦朝开始建立，逐渐扩大，到东汉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并且产生了世代在中央和地方做高官的世家望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东汉时期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太学生（在当时最高学府太学学习的学生），也不断增加，桓帝和灵帝时期已达三万人。

宦官集团把持朝政，阻碍了一些官僚的升迁，堵塞了一些太学生的仕途。同时，由于政治黑暗腐败，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一些太学生便抨击宦官，议论朝政，要求改善政治，有的则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打击宦官的党羽。如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贪残犯法，逃匿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掌京师地区纠察）李膺派人到张让家将张朔捕获处死。杜密任北海相、刘祐任河东太守，也都翦除了所属县令中的一些宦官党羽。这种情况，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恐惧。他们依靠皇帝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锢音固gù）事件。

一六六年，宦官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所谓“党人”下狱治罪。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第二年，虽然把这些“党人”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一年桓帝死，灵帝（十二岁）继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合作，打算消灭宦官势力，结果为宦官所杀。一六九年，宦官又奏捕“党人”杜密、李膺等百余人入狱。他们相继死于狱中。一七二年，宦官又一次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一七六年，灵帝下诏，凡是“党人”较近的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在两次“党锢”事件中，不少主张改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的“清流”

官员和知识分子被杀或禁锢终身。“党锢”事件表明东汉政治危机的加深。

桓帝时期，东汉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如口赋（人头税的一种）改为从一岁缴纳（过去是从七岁开始），田税则一亩加十钱。灵帝更是一个贪财如命的家伙，他专门在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把国库中的大量民脂民膏，据为己有，积贮在这里。他还亲自到河间“买田宅”，以“为私藏”。为了搜括更多钱财，他甚至把各级官爵定出价钱，公开拍卖。如规定二千石的官职为两千万钱，“公”为一千万钱（地方官比朝官贵，是因为任地方官便于直接搜括民众），“卿”为五百万钱，关内侯为五百万钱。定价之外，还看求官者的身分和财产状况，灵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半价（五百万）买个司徒，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买太尉就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司徒和太尉都是“公”）。有钱的可以现钱交易；暂时无钱的，可以赊欠，任官后要加倍付给。不仅如此，灵帝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还以助军和修宫室的名义，要他们向西园缴纳若干钱（多者几千万，少者几百万）。少数清正的地方官不满意这样做，有的辞官，有的被逼自杀。如钜鹿太守司马直上任时，被摊派纳钱三百万，这个数字比较起来不算多，但司马直不快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便称病辞官，皇帝不许，乃服毒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买官的人，还是被硬性摊派的人，上任后都千方百计地搜括人民，一个个都成了“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的贪官污吏。

由于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的兴修和维护，因而造成多次水灾。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桓帝、灵帝时就有十三次，占水灾次数的二分之一；同时，水利不修，又造成旱灾的扩大，东汉时大的旱灾共发生十

七次，桓帝、灵帝时就有六次，占旱灾次数的三分之一。水旱灾的不断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灾难。

东汉后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民地主及各级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甚至倾家荡产，四处流亡。全国到处出现了“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甚至产生人吃人的现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时黄巾起义以前，各地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六十多次。他们有的称“皇帝”，有的称“黑帝”，有的称“太上皇帝”，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迫切愿望。虽然这些起义由于力量单薄，先后都遭到镇压，一一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屠刀，前仆后继的精神是可贵的。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首歌谣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与他们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八四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起义前，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在当时的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包括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广大地区）都有信徒。张角把他们



黄巾起义（创作画）

组成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大、小方都有渠帅率领，统一归张角指挥。张角根据农民群众要求推翻东汉腐朽统治的愿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苍天指东汉朝廷，黄天指张角为首的黄巾军），把矛头直接指向东汉政权。张角决定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但由于他的弟子唐周叛变，把起义的机密出卖给敌人，张角不得不决定提前于二月起义。因为起义群众头上裹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被称为“黄巾军”。

黄巾起义之后，受到了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他们焚烧官府，镇压官僚、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早在黄巾起义以前，东汉统治集团中就有人感到张角太平道党徒的危险。司徒杨赐曾提出一项瓦解破坏张角队伍的恶毒计划。他建议皇帝命令地方官甄别流民（太平道徒好多是流民），

将他们送回原籍，以便孤立和削弱张角的徒众，然后再杀掉张角徒众中的渠帅（首领）。但他的这一计划未得实行，黄巾大起义就爆发了。

黄巾大起义的爆发和发展，震动了东汉统治者，使他们不得不缓和一下内部的矛盾，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农民起义军。灵帝先宣布赦免在“党锢”事件中遭受禁锢的“党人”；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皇甫嵩、朱儁（音俊 jùn）、卢植等领兵开赴各地镇压。各地的豪强地主也组织反动武装，协同东汉政府军全力向起义军进攻。

黄巾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将矛头指向东汉首都洛阳。冀州地区的黄巾军，一开始就活捉了东汉宗室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还杀掉了幽州刺史郭勋。这支起义军在张角兄弟的亲自率领下，占据了广宗（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等地，打败了由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先后率领的官军。与此同时，南阳地区的黄巾军在张曼成指挥下，攻下了郡治宛城，杀死了南阳太守褚贡。颍川地区黄巾军，在波才的指挥下，打败了右中郎将朱儁、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太守赵谦，并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城内。

各战场上的黄巾军把官军打得狼狈不堪，表现了大无畏的造反精神，连大刽子手朱儁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万众一心，犹不可挡”。

由于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包围长社的队伍依草结营，在一个刮风的夜里，被皇甫嵩放火突袭，造成慌乱，加上朱儁、曹操的合兵攻击，这支起义军被镇压下去。接着，朱儁移兵进攻南阳的起义军。南阳起义军同敌人浴血奋战，在首领牺牲的不利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最后力量不支，也遭到失败。当南阳的黄

巾军同敌人殊死战斗的时候，冀州的黄巾军也同东汉政府军展开着激烈的决战。颍川黄巾军被镇压后，东汉政府忙把黄巾军手下败将董卓撤掉，改由大刽子手皇甫嵩率兵前来冀州镇压。这时，张角不幸病逝，其弟张梁继续领导战斗。他们在广宗不断打败敌军。后来，由于起义军麻痹大意，遭到敌人的夜袭，张梁战死，起义军不少被敌人杀害，有的投河而死。接着，皇甫嵩向下曲阳的张宝进攻，将下曲阳攻陷，张宝也壮烈牺牲。

黄巾大起义共历时九个月（一八四年四月——十一月）。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在战争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失败了。

黄巾军主力虽然失败，但其他各地的黄巾军依然继续坚持斗争，特别是青州、徐州的黄巾军以及在黄巾军影响鼓舞下的冀州黑山军，斗争坚持了很长时间。

黄巾起义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它逐渐趋于瓦解，名存实亡了。

二 逐鹿中原的开始

——军阀割据和混战

黄巾起义军主力被镇压之后，一度缓和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激化了。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剧烈起来。

秦汉时期地方政府实行的是郡、县两级制。西汉武帝刘彻时，虽然设置了十三州刺史，但当时的刺史是监察官，负责本州的监察工作，无兵权，也无治民之权。当时的刺史既不是行政官吏，州也不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